

改革开放前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再认识*

张泽强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改革开放前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思想、实践和制度成就,为改革开放后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立足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历史节点,回首改革开放前 30 年的艰辛探索,展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重新认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确立的“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建设原则以及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这一根本保证,对我们今天开展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2528 (2018) 05-0073-006

DOI:10.16580/j.sxlljydk.2018.05.0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了一系列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推进了一系列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出灿烂辉煌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1](P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党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

质基础。”^{[2](P10)}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联系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联系不断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巩固和维护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领袖、国家掌舵者、人民领路人”的核心地位,再次回顾、梳理和反思改革开放前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理论成果和经验教训,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研究”(项目批准号:16CKS020)的阶段成果。

幸福生活，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一切爱国志士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矢志追求和不变初心。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扣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发展要求，依据中国具体国情，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对开辟、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也成为党的十九大制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参照。

第一，这个目标首先表现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便把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3](P350)}的号召。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出了“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使“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表述更为直观、更为具体。随着“一五”计划提前超额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表述上也做了相应调整，进一步突出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形成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4](P207)}的提法。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5](P116)}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向全国人民宣告了一定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宏伟目标。至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认识更为明确、更加清晰。

第二，这个目标还表现为要成为一个“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大国。中国在历史上曾长期领先于

世界，并对世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些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国甚至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头号强国。但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日渐衰落，最终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获得了独立和解放，实现了“站起来”的百年夙愿，同时也面临着重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何种姿态再次走进世界的重大课题。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曾预言：“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两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4](P156-157)}“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4](P89)}毛泽东的上述观点，反映了当时党中央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上的认识，反映了中国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发展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即中国应该积极融入世界，多承担一些国际责任，做人类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世界和平的维护者。这种认识体现了当时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抉择注入了历史基因。

第三，实现这一目标的时间估计和战略步骤。对何时、采取何种方式实现强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战略目标，党中央和毛泽东也经过了反复思考和酝酿。特别是毛泽东还多次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

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3](P390)}10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提出，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鉴于“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反复强调，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1962年1月，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5](P302)}1964年，三届人大正式通过了经济发展“两步走”的发展步骤，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是我们党最早提出的关于我国经济建设远景规划的蓝图，为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步走”发展战略、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阶段战略安排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目标决定方向，方向决定道路。党的十九大把改革开放前就已经明确的“建成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拓展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作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既体现了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事关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巩固和人心向背，又体现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认知上所具有的一致性，无疑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改革开放前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视角。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列宁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6](P398)}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如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一样，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其中，既要科学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要正确认识中国的现实国情。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和分析实际问题；客观认识中国的现实国情，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一切有利和不利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以及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唯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找到一条正确的建设道路。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离不开正确认识和看待苏联经验。十月革命的榜样效应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使得“苏联经验”抑或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成为20世纪上半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参照，在个别领域甚至是唯一参照。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要学习苏联，但在如何学习苏联经验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和毛泽东还是比较谨慎的。1953年他曾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那末，我们现在学习苏联，广泛地学习他们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3](P263-264)}在这里，毛泽东以极其谦虚的态度，表达了想通过借鉴和运用苏联经验，加快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强烈渴望，但从讲话中使用的“苏联的先进经验”“各个部门的先进经验”“他们所有的长处”以及“我们用得着的”等语汇来分析，他实际上也表达了要以科学和辩证的态度看待苏联经验的意思。“一五”计划开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独创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并对盲目照搬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验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我们要向先进的国家和民族学习，学习对本民族有用的东西，但不是所有的方面都要学别的民族，而要保持本民族的特点。”^{[7](P949)}“有人因为苏联是设文化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4](P41-42)}党中央和毛泽东逐渐认

识到，苏联经验并非都适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毕竟不能代替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后来受到苏共二十大的影响，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定把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提到工作日程上来。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坚持以国情为根本出发点，注意量力而行。国情是涵盖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等诸多要素的综合概念，随着时代和国家发展不断发展变化，对国情的认识也不能固定不变。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更需要党对国情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和准确判断。1956年4月，毛泽东就指出：“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8](P23-24)}几天后，他又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P23)}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通过对我国具体国情的分析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部分经验的总结进一步谈道，“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9](P605)}梳理毛泽东这些讲话及此前对苏联经验的分析不难看出，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中国应当而且能够找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强化了国情特殊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尽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没有改变，我们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在破解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都要充分体现这个基本国情的必然要求。正如习近平所言：“任何超越现实、超越阶段而急于求成的倾向都要努力避免，任何落后于实际、无视深刻变化着的客观事实

而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和做法都要坚决纠正。”^{[1](P16)}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正确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毋庸讳言，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遭受严重挫折。对此，习近平指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1](P11)}从历史来看，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在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初再次提出了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8](P23)}这一历史性课题，而且也朝着这一方向作了很多有益的实践探索。但在具体探索过程中，主要是由于党在思想路线上逐渐偏离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导致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严重“左”倾错误。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曲折，也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间还不长、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多，也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和苏联先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威胁和封锁，我国在这一时期承受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使党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矛盾新问题，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容易把党内同志间的正常争论也被看作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表现，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问题的严重误判。在上述内外部因素、主客观原因的共同作用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曲折。改革开放前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成功与失败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充分反映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能够探索出一条既合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又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复杂性。作为一个探索的过程，如果只有成功，

没有失误和教训，那这段历史将是不完整的，也不符合事物发展所遵循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基本趋势。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没有毛泽东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党中央也不可能在改革开放后顺利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改革开放前奠定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也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接续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一大法宝。正如邓小平所言：“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P3)}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随之成为贯穿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共产党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重申“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并将它置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这既是对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成就和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的高度自信，也是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极端重视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核心地位的继承和发展。

第一，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领导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之一，自然从根本上决定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最后到达共产主义的必然前途；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自觉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展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辉形象。正如毛泽东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1](P1097-1098)}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表达出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领导核心的思想，只是还没使用相应表述。

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推动了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建设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1951年9月，毛泽东结合镇压反革命工作，突出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指出：“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3](P123)}1952年，毛泽东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建设实际，进一步明确了党的领导责任：“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3](P252)}1954年，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P350)}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在自信地向全国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平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7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向世人展示出强大的治国理政能力，同时也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能够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宝贵经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更为繁重，使命也更加光荣。针对有人提出的“请共产党下台”“中共组织退出机关、学校”等错误论调，毛泽东针锋相对提出：“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4](P231)}他还提出必须把坚持“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4](P234)}作为判断国家政治生活中言论和行动是非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受到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党中央和毛泽东更加重视加强党的领导的问题。1957年，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4](P303)}这是毛泽东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是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在当年提出的这个理论原则，对全党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武装。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5](P305)}1973年，毛泽东再次强调：“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12](P511)}可以说，不断巩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布局中的核心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作用，恰似一条红线贯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确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正确方向。

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既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度众说纷纭的重要问题，也是中

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面临的崭新课题。围绕回答这个问题，党领导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前后两大历史时期、近70年的艰辛探索。习近平通过揭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明确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再次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历史贡献。立足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首改革开放前30年的艰辛探索，展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更加深刻体会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展开，改革开放前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必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显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 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8] 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 [9]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张楠